

文章编号:2095-0365(2013)04-0044-05

# 霍尔高低文化语境理论的现实阐释

## ——解读“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段晓芳, 郭增卫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08)

**摘要:**当前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社会现象引发了社会共鸣。人们倾向于将这种群体行为理解为是一种不文明行为。但如果是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下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习得的社会行为,就不能仅仅从公民个体素质方面来理解这一行为。而应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文化学家泰勒指出,每一群体、每一社会都有一套显性的或潜性的行为模式。这些共同的行为模式叫做文化。个人的习惯模型是由适应既成的习惯模型形成的,即人的行为就是文化行为,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塑造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高低文化语境理论来解读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破解“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关键词:**中国式过马路; 高低文化语境理论; 思维; 群体取向; 隐形规则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 一、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与文化

中国式过马路,是人们对大多数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一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央视《新闻直播间》对其报道之后更加广泛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中国式过马路,表面看似是一种不文明、违反交通规定的现象。如果是少数群体出现这样的行为,尚可理解为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或公民素质低的表现。可如果是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下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习得的社会行为,就不能仅仅从公民个体素质层面来理解这一行为了。立足于从文化视角阐释这一社会现象。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总结之全体。这种复杂总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这里所说的人,是指社会的一个分子而言的。各式各样支配社会行为的风俗、传统、态度、观念,便是文化。每一群体,每一社会,都有一套明显的或不明显的行

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多多少少是该群体的分子所共有的。这些模式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且也常常会改变。这些共同的行为模式我们叫做文化。文化是社会互动的产品。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以内是文化行为。个人的习惯模型是由适应既成的习惯模型形成的,这种既成的习惯模型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个人是生长在文化里的。任何文化是由一组习惯的和传统的思想方式、情绪和反应方式构成的。这些方式足以表现一个特殊社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境里应付问题时特别不同的地方。”<sup>[1]</sup>。因此,文化对行为具有塑造作用。

### 二、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

根据交流中所传达的意义是来自交流发生的场合还是来自交流所使用的语言,人类学家霍尔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种。他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到:“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来传递,或内化于交际者的思维记忆深处,显性的语码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人们对交际环境的

收稿日期:2013-06-24

作者简介:段晓芳(1984—),女,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与英美文化。

种种微妙之处较为敏感。高语境的交流或信息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即指大多数信息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清楚地以编码的方式进行传达。”<sup>[2]35</sup>。所以在高语境环境下,通过环境以及其它因素就可以获得信息,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用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传统文化视天、地、人三者为和谐的统一体,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关系中一员,因此这就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各种隐形的关系以及行为可以自我认知<sup>[3]61</sup>。

“低语境交流正好相反,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即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大量的信息由显性的语码负载,隐性的环境传递出相对少量的信息。”<sup>[2]36</sup>。也就是说,在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习惯借助言语的力量来交际。根据霍尔的定义,而在低语境环境下,人们缺少相同的经历,所以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需要详细的背景信息,相比之下它主要依靠逻辑、推理、思维和语言表达,是一种直接的外在的言语交流,话语本身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信息,语境和参与者方面只包含极少的信息。

### 三、高低语境文化的形成

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之所以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有其哲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渊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灿烂文明积淀,而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儒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和谐的统一体,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关系中一员,因此这就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各种隐形的关系以及行为可以自我认知<sup>[3]61</sup>。除了儒家学说,道教和佛教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讲究禅意,在无声的空间让人们有所感悟与体会<sup>[4]</sup>。道教由老子创立,它认为,万物皆有阴阳、虚实,人们必须注意两者的辩证与统一。这些正是中国高语境文化形成的主要根源。从地理和经济因素来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们习惯于群居、混居。在漫长的集体生活中,人们已经习得对一些隐形的规则,无需体现在语言等显性层面等。像北方地区的“四合院”,众多

人口居住在一片狭小的天地里,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们高语境文化意识。在经济形态上,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发展史,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得越来越深刻,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个人置于群体中。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交际以及行事中重“意会”、“领会”,“尚象”,尚“言象互动”<sup>[3]61</sup>。中国传统文化的風水,易经八卦,都是高语境文化的体现,体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相克相依的关系。

西方属于低语境文化。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交际中,十分重视“言传”,即“尚言”<sup>[3]62</sup>。之所以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也有其哲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渊源。从哲学宗教信仰来看,低语境文化历史根源后追溯到整个欧洲文化的基础——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古希腊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是理性的个体,人的理性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sup>[3]</sup>。中世纪后,伴随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humanism)为旗帜,力图复古中世纪前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以人性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全面自由解放,追求人的才智的全面发挥以及自我尊严、意识的培养。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文化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对于西方文化形成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基督教作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形式,对于西方语境文化也给予深刻的影响。从历史地理渊源看,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封建社会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以资本主义精神立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众多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来到美国创业、发展,期待着实现自己的“美国梦”<sup>[5]104</sup>。此外,美国的地理概貌特点是地广人稀。驱车行驶在美国广袤的土地上,除了大片相连的田野和土地之外,很难看到像中国“四合院”式的热热闹闹聚族而居的村落。美国人的住处之间相隔甚远,即使是住在附近,也是独门独户,相互之间很少来往。当然邻里之间也几乎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形成紧密而又依赖的关系<sup>[5]105</sup>。这些因素导致人们的交际和行事无法依赖于语境,因为人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境元素,促成了低语境文化的形成。

#### 四、高低语境文化与群体取向思维和隐形规则

霍尔指出任何事物都被赋予了高、中、低语境的特征,文化也不例外,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其文化观念、思考模式和语言结构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sup>[6]</sup>。东方与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是悬殊的。高低两种语境文化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首先,高低文化语境对群体取向思维方面会产生差异。具体来说,中国的高语境文化会使得处于文化中的社会成员更容易趋向群体取向思维。因为高语境文化中,人们交际和行事很大程度都依赖于个体所处的情境中,这就需要各个社会成员在思维上具有趋同性。否则,无法达到有效的交际行为。而低语境文化中,人们之间的交际对情境的依赖度较低,这就允许个体思维差异性的形成,因为通过语言也可达到有效的交际行为。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道家代表庄周提倡“与天地并生,而与万物为一”。新儒家大师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诸多体现,如中国的姓氏是家族整体的姓在前,家族个体成员的名字则在后,而西方则正好相反,家族的姓在后,个人的名字在前。汉语中常说:他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总是先说大的地方,然后说小的地方,而翻译成英文则是:He was born in Shen Yang city, Liao Ning province。先说个体,然后再说整体。因此中国文化重视整体。太极式思维模式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7]</sup>。中国传统文化之整体本位观念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得处于这种文化当中人们更容易采取群体行事方式。整体思维观念使得中国人行事方式具有群体取向和趋同性。中国的群体取向的特点从其社会性来讲,表现为从众心理。这种群体取向的文化倾向也形成了一个社会生活层面上的趋势:形成协同的群体行为。而西方重视个体,对于西方人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西方文化注重逻辑思维,分析思维导致了它注重个体。这种观念将个体、个人作为社会的逻辑元点和价值元点,反映在社会行为上就是个体行事方式这种个体本位观念使得社会成员更容易形成个体取向思维和行为的差异性。当然,个体本位观念并不是一定没有群体取向行为,只是与集体

主义相比较,在行事的时候更倾向于个体优先考虑,不容易产生趋同思维与行为。

另一方面,高低文化语境对于处于文化中的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高语境文化具有模糊特征,而西方低语境文化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文化语境特点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国人的思维注重悟性,西方注重逻辑推理。高语境文化的特点是内隐性和注重悟性,要求人们从语境中去体悟。高语境文化使得群体取向的文化倾向也形成了一个社会生活层面上的趋势:形成协同的群体行为。在群体取向思维下,在社会各个方面人们更加容易形成统一的不言而喻的潜规则行为。规则对中国人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有时候是没有作用的。这一切与社会情景有关系。Linell认为,儒家人文主义的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似乎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要视情境而定<sup>[8]</sup>。元气论和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中的规则意识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后者比前者更强调规则性。高语境文化中,规则的执行更具人情因素。在一个提倡相互依赖的高语境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具有趋同性,人们会认为这是缺乏变通性。美国的个体主义强调具有独立行事能力的个体。这与中国文化相比,更注重规则意识,少了很多的人情味,淡化了社会人际关系的作用。来自于低语境文化中的人更愿意按照普世原则处事。

#### 五、从高低文化语境解读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文化对行为具有塑造作用。“文化”像一个有着具体、独特的个性的人,他一心一意地行事。人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来界定和约束的。文化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决定着处于文化中人们行为的形成<sup>[9]</sup>。因高语境文化更容易产生群体取向思维和潜规则性,故基于高低语境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中国式的集体闯红灯过马路现象。

首先,中国式过马路是一种群体行为。高语境行为源于过去,受传统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变化缓慢,具有高度稳定性,所以在高语境环境下,人们进行日常交流时并不需要详细深入的背景信息,一致的信息会获得对外环境的一致反应,人们

可以通过手势,空间的使用甚至沉默等非语言交流的方式来提供信息。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下易产生群体思维。而群体思维又决定着群体行为取向。具体而言,当大部分都闯红灯时,其余的人们也会在行为上呈现趋同性。久而久之,受到这种群体取向思维的支配,就会出现社会成员的群体行为,而非少数个体的行为。

其次,中国式过马路具有潜规则性。高语境文化中,潜性规则的执行更具人情因素。在一个提倡相互依赖的高语境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具有趋同性,人们会认为这是缺乏变通性。社会成员的非言语交际行为依赖于一定情境中,人们逐渐形成一种不言而喻的隐形规则,而这一隐形规则比显性规则更加容易支配社会成员的行为。人们一般倾向于按照隐形规则行事,而非显性规则。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中,显性的交通规则大家都明确了解,即红灯时人们应该等待,不允许穿越马路。而人们的行为却没有与这一规则一致。人们的行为是按照隐形潜规则发生的,即虽然是红灯,只要车辆还没有来到很近的距离时,就可以穿越马路。大家都这么做,没有人会受到处罚的。

## 六、结语

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一种不文明或公民素质低的表现。从这文化的定义来看,不难看出这一现象属于特定文化范畴,可以从文化角度来

解读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文化的产生又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密不可分,思维又决定人们的行事方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成员的行为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决定着处于文化中人们行为的形成。霍尔指出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其文化观念、思考模式和语言结构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高低两种语境文化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高文化语境对更容易使得社会成员形成群体取向思维,并且高文化语境使得处于文化中的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淡化,形成潜规则性。因此,基于高低语境理论,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解释中国式的集体闯红灯过马路现象。不同文化模式之间无所谓优劣,所有的文化都植根于特定的土壤、社会的需要。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要客观正确处理文化中不同因素。高语境文化更容易产生群体取向思维和隐形规则。文化对行为具有塑造作用。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文化是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发展并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最基本的因素<sup>[10]</sup>。当今社会所倡导的是和谐与文明,通过分析可知,造成现今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文明行为源于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这些定势又进一步制约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要破除摒弃这些不文明现象,只有对其进行全面把握,才能促进社会的协调推进。

## 参考文献:

- [1] 泰勒. 原始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
- [2]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Company,1976: 35-36.
- [3] 连淑能. 中西思维方式: 悟性与理性[J]. 外语与外语教,2006(7):61-62.
- [4] 冯凭. 理性与悟性[J]. 社会科学研究,1986(2):50-51.
- [5] 费孝通. 美国与美国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04-108.
- [6] Hall Edward T. 超越文化[M]. 居延安,等,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201.
- [7] 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4-86.
- [8] Linell, C. Doing cultur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Press,2001:65.
- [9] Davus L.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Action[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1:75.
- [10] 刘敬严. 完善文化需求表达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健康发展[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6-58.

## An Explanation on the Chinese Way of Crossing the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ll's 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Theory

DUAN Xiao-fang, GUO Zeng-w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08,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way of crossing the road has triggered the widespread response among the whole society. This kind of group behavior is typically viewed as one of the immoral behaviors. However, given that almost a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display the same universal behavior, it should not be only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literacy, but also reviewed further from the cultur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finitions of culture provided by some anthropologists, people's common behavior patter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ulture. Social members who situate the same culture context tend to acquire the same behaviors.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people's behavior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theory, the underlying social cultural mechanism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way of crossing the road" is figured out.

**Key words:** the Chinese way of crossing the road; 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theory; thinking; group-oriented; behavior

(上接第15页)

- [21]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49.
- [22]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J].当代经济研究,2011(2):43.
- [23]胡一帆,宋敏,郑红亮.所有制结构改革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4):63-64.
- [24]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1):127.

- [25]刘世军,权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3):13.
- [26]熊德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关系探索[J].扬州大学学报,2002,6(2):84.
- [27]赵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探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6):54.

##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n Nearly Five Years

QIAO Hui-bo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hotspot of academia since China's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basic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forward at the Fif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study has made some new progres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based on which 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period were overviewed roughly and some representative point of views were commented simply to promote the studies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public ownership